



肃府本《淳化阁帖》： 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大型书艺法帖

中国的书法艺术，经过了秦篆、汉隶的坚实发轫，至宋代进入空前兴盛期。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成熟期，反映在文化领域的宏观特色便是汇集和总结，与文化整体繁荣的昌隆气象相应，书法艺术也达到高峰。书家各领风骚，书法园圃中名家辈出，堪称万紫千红，满园芳菲。而书法史上对后世影响巨大的“帖学”，也大盛于宋。宋代是我国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，精巧的雕刻技艺和高明的拓印书法，为帖学提供了优越的物质和技术条件。

成都博物馆“汉字中国——方正之间的中华文明”特展上，有一件国家一级文物值得特书一笔，那就是来自甘肃省博物馆的肃府本《淳化阁帖》。淳化阁帖是北宋王朝编印的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大型书艺法帖，集宋代以前书法精品之大成。所谓帖学，是说将名家名作精工勾摹，刻于木、石之上，刷墨而拓印之，拓纸装订成册，后名之为“帖”。帖学的勃兴是书法艺术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现象，是书法艺术已经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确定其光辉地位的标志。那么，这件文物对我们研究书法的发展和起源有哪些重要意义，又如何影响了中国书法的进程？日前，甘肃省博物馆保管部副主任刘光煜接受华西都市报、封面新闻采访，分享了这件镇馆之宝背后的故事。

我国首部大型书艺法帖 保留了二王艺术风格

淳化三年(992年)，宋太宗赵光义命翰林侍书王著，把宫廷收藏的书法珍品编为十卷，前五卷包括历代帝王、名臣及百家的各体书作，后五卷专收王羲之、王献之父子的草书。编成后，用枣木版摹



肃府本《淳化阁帖》

刻成帖，版成后藏于禁中之淳化阁，故名之为“淳化秘阁法帖”，简称淳化阁帖。

刘光煜介绍：“宋太宗赵光义是极为‘留意翰墨’的君主，我们说的大盛于宋代的‘帖学’，就是由赵光义首开风气之先。他不仅广泛罗制历代名家墨迹，而且加以推广传布。总体来说，《淳化阁帖》是众体皆备，名家尽聚，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物价值，也对中国历代书法的源流起到非常好的保护作用。”

王羲之的书法真迹无存，《淳化阁帖》对于研究其书法艺术有何帮助？刘光煜认为，《淳化阁帖》起到了保护书法作品真迹和延续文脉的重要作用。“《淳化阁帖》用将近一半篇幅选收王羲之、王献之父子的作品，羲之墨迹入选161帖，足以见得当时尚王、宗王风气非常兴盛。对于保存二王的艺术风格而言，它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。立足今天来看，宋代以前诸家真迹极少，如果没有《淳化阁帖》在内的古帖传

世，我们怎么能一睹当时的笔风意态？”在这之后，人们在此帖基础上再加演变，或仿或选，或增或删，新刻层出不穷。但千变源于一宗，《淳化阁帖》实为诸帖之祖。虽然后世有书法家认为，习者拘于帖式，墨守成规而拘束了个性才智，但帖学对于汇集、保存古人墨迹，为习字者提供佳法典范，指明路径，从而推动书法艺术的社会化，还是成就昭然、功不可没。

历经波折终成稀世珍宝 由甘肃博物馆保存至今

《淳化阁帖》木版刻成后，只拓印了不多的帖本以赐皇戚近臣，不久即毁于火。那些初印即成绝版的帖本遂身价大增，重金难觅。人们据之再行摹刻，辗转仿作，没过多少时间，便出现鱼龙混杂、真伪难辨的局面。到了元代，《淳化阁帖》真本已成罕见的稀世珍宝。

“明朝朱元璋深知发展文化事业的

重要性，对皇室子弟的教育也颇为重视。朱元璋的第十四子朱瑛被封为肃庄王时，朱元璋就将一部宋初拓印本《淳化阁帖》送给朱瑛，朱瑛的领地在西北，肃王府设在兰州城，所以该帖又被称为‘兰州本’。肃王府视该帖为传代之宝，深藏内府，秘不示人，直到万历年间肃宪王朱绅尧时，情况才发生改变。”刘光煜介绍，朱元璋御赐朱瑛的阁帖，正是宋代翻刻版本的佼佼者。

万历四十三年(1615年)，金石摹刻名手温如玉、张应召主持其事，用双钩技法将此帖重摹于陕西富平所产铜磬石上，历时七年，刻成帖石144块，大多是两面刻文。“这套淳化阁帖刻石的依据是官廷所藏宋拓真本，主事者又是深谙此道的专家，并且采用了能使刀路保持齐平规整的石材，所以字态神妙，格调高逸，深为书家称誉。”刘光煜介绍，据甘肃省博物馆研究书法的老专家秦明智、徐祖蕃两位先生考证，肃府藏本的前八卷，的确是当年北宋宫廷刻版原拓，但卷九临摹南宋别本，卷十临摹南宋淳熙年间刻的“修内司帖”。在明朝翻刻的阁帖中，肃府帖的祖本虽然掺杂不一，仍不失为流传有序的较好版本。肃府刻石后来屡遭破坏，明清之际尤多佚失缺损，直到清顺治年间才重新补齐。延至清末，几经战乱后，帖石已非全璧。此后得到教育家赵元贞先生的长期保护，有幸再未缺失。

1966年，存石142块移交甘肃省博物馆珍藏，已被国家文物局文物鉴定专家组确认为国宝级文物。肃府本《淳化阁帖》是甘肃省博物馆16件镇馆之宝之一，平常很少外展，对于成都观众来说非常不容易看到。

对于此次国宝出门，刘光煜说，“即便是在甘肃省博物馆展厅里，我们也只展出两块《淳化阁帖》，外出展览机会难得。之后我们也会考虑，让更多馆藏国宝文物外出参展。”

华西都市报-封面新闻记者 罗海韵

先秦重器秦公钟：春秋时期早期秦文化的见证者

正在成都博物馆“汉字中国——方正之间的中华文明”特展上展出的秦公钟，是1949年后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，这件春秋时期的青铜器文物纹饰优美、制作精良，具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。那么，秦公钟的铭文记述了怎样的故事，又有哪些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？日前，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、副研究员王竑接受华西都市报、封面新闻采访，讲述了这件文物的重要意义。

记载秦国开国史和郡县制

秦公钟的铭文有135字，与秦公镈上的铭文相同，记载了秦人的开国史，包括先祖襄公“赏宅受国”和文公、静公、宪公治国安邦的业绩。王竑介绍，“秦人立国是从西周灭亡开始的。我们能够从铭文中知道秦公钟的主人是秦武公，这组编钟是秦武公为了祭祀先祖而作，他将自己对祖先说的话记在了钟身上。同时，我们还能从铭文信息中得知，秦武公的夫人是姬姓贵族，由此推断出秦人和姬姓周人以婚姻形成政治联盟。相比于其他六国，秦国起步较晚，秦人在西周灭亡时才成为诸侯，为了增强实力，与中原诸国抗衡，秦武公选择了与周人联姻。”

秦公钟铸于秦武公初年，距今已2700余年。铭文中的时任秦公是精明能干的国君，他广聚人才，征服周围的部族



秦公钟

秦公钟

方国，与文献中记载的秦武公事迹吻合。“秦武公在历史上是非常有作为的人，其能力不亚于秦始皇。西周时期，国家的管理采用的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下的分封制，秦统一六国之后采取了中央集权制的国家管理体制，对地方采用设县由中央直接管理的模式，是当时普遍推行郡县制的具体体现。秦国的郡县制是从秦武公开始的，他将新开拓的疆域划分为县，县令直接由秦王任命，从而强化了国家的实力。”王竑认为，考古发现对历史记载起到验证作用，同时也能够证明文献记载的真实性和准确性。

铭文字体在书法史上承上启下

王竑说，“在秦人发展的历史中，秦

公钟上的文字属于早期文字，比石鼓文成熟了许多。从字体上来讲，秦公钟的铭文书法介于石鼓文和大篆之间，有承上启下的作用，为秦始皇统一文字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。”从书法史的角度来看，钟和镈上的铭文字体隽永灵秀，起笔重落笔轻，落笔处纤细而尖锐。这种铭文字体处于大篆向小篆过渡的阶段，是春秋初期秦篆的典范，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。

5件秦公钟为一组编钟，形制、纹饰沿袭了西周后期的编钟风格，最大的通高48厘米，重24公斤，最小的通高27.6厘米，重6公斤。秦公钟鼓部饰有对称的两个顾首龙纹，鼓中部饰有相对的凤鸟纹，那么这些纹饰有何特殊含义？王竑告诉记者：“钟是中华民族古代特有的

打击乐器，而合瓦形的钟为‘双击频’乐器，秦公钟鼓部和侧面的纹饰实际上是标音符号。敲击钟的正鼓和侧鼓会产生不同乐音，实现了‘一钟双音’，这是古代中国在音乐科技上的一项重大发明。它大大节约了制作成本，利用最少的乐器数量，完成复杂的音乐演奏。”

体现了礼乐文明的特点

编钟在祭祀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，秦公钟作为春秋秦国的青铜乐器，主要用于祭祀祖先的场合。王竑认为，在中国礼乐文明中，“礼”和“乐”是不能分割的，“‘礼’象征的是规矩，这些规矩森严肃穆，规定了哪些事情能做，哪些事情不能做，而‘乐’起到了调和作用。在青铜编钟的铭文中，我们经常能发现‘和’字，实际上古人用音乐来协调不和谐的地方，因此秦公钟在礼乐文明中的地位是非常高的。”王竑还提到，秦人通过祭祀寻求中原文化的认同，建立了统一的国家，学习了周人的礼乐文明，秦人的语言、文字、乐器等方面都体现了礼乐文明的特点。

秦公钟出土于陕西宝鸡陈仓区太公庙，处在宝鸡、眉县和岐山相邻处，根据文献记载，这里是春秋早期秦都平阳。秦公钟的出土为考察平阳提供了重要线索，是已经发现的春秋秦国文物中重要的一批，现收藏于宝鸡青铜器博物院。

华西都市报-封面新闻记者 罗海韵